

党的源头和发展的隐蔽战线的

□ 顾元罡

毛泽东曾讲过，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的确，在中国共产党艰苦漫长的斗争历程中，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党和国家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追忆那些默默无闻、英勇无畏的无名战士，缅怀他们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卓越功勋，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

发轫于特务工作处

1927年5月，我们党最早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特务工作处在汉口成立。当时，上海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鉴于这次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周恩来倡议并于汉口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标志着我们党隐蔽战线工作的专门机构开始萌芽。

“特务”本意是指执行特殊勤务、特别任务的人。武汉时期我党的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事部，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其下设保卫股、情报股、匪运股和特务股。保卫股负责保护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安全；情报股负责搜集当时武汉重要动向和情况；特务股份称“打狗队”，负责惩办党内叛徒，同时执行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任务；匪运股负责联系帮会组织，争取改造土匪和收编民间武装，促其参加革命队伍。

特务工作处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位于胜利街的中共中央机关。当时，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瞿秋白等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研究工作。特务工作处的警卫人员昼夜值班，在对来访者进行详细盘查后才放行。其时他们工作十分活跃，工作人员往往拥有国共双重身份，情报来源多种途径，并且成效十分明显。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及时得到情报，使陈独秀及中央所有成员成功避开国民党的搜捕。随后，八七会议召开，特务工作处精心安保，使国民党警探对鼻子底下的“惊雷”一无所知。

后来，中共中央又从武汉迁回上海，特务工作处也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它虽然只活动了3个月，但培养了中共最早的特工干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成为我们党隐蔽战线的发轫而载入光辉史册。

探索于中央特科

1927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亲自指挥。下设四个科：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务事项；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情报工作；第三科为行动科，承担惩办特务、镇压叛徒的任务；第四科是无线电通信科，负责无线电的通信联络工作。

中央特科从建立之初起，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专门举办了训练班，亲自作政治报告，讲解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原则，明确秘密工作纪律，同时组织学习侦查与反侦查、密码破译、密写技术等，并组织乘船去海上进行射击训练。

作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中央特科利用各种复杂人际关系发展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国民党通讯社以及其他党政军机关和一些要害部门，建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关系，在敌人的“心脏”里截获了大量核心机密，多次传递准确情报，为党及时正确的决策赢得了时间、提供了支撑。后来被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掌握了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情。由于中央特科工作得力，确保了党中央机关安全并得到扩大发展。

1931年4月24日，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使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几乎瘫痪。随即，周恩来对中央特科进行了整顿，并于1931年6月10日，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新规定了中央特科今后的组织、工作方针和纪律。此后，重新调整的中央特科在陈云的领导和潘汉年等同志协助下，在加强政治领导、调整组织、改变工作方法、重建反间关系方面收到明显效果，仍保持了作为“有战斗力的白区地下组织”的重要作用。1935年9月，因中共在上海的领导机关被彻底破坏，中央特科也停止了活动，结束了使命。

中央特科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个专门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先后存续了8年时间，开创了隐蔽战线工作的许多先河，尤其探索总结隐蔽战线的生存法则、斗争策略、队伍建设、手段运用、资源物建等一系列的基本路子，为党的隐蔽战线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队伍，为后来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成熟于中央社会部

1939年2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在延安枣园后沟成立。为了应对当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央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掌握情报资料，于是，中央书记处便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社会部的决定。1941年9月，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

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从上海时期的中央特科和江西苏区时期的中央政治保卫局的同志中选拔的。其主要职能是，加强对各抗日根据地的锄奸保卫工作和边区情报工作的领导。具体来说：一是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是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三是收集敌探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他们的警惕性。四是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是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做此种工作之干部。

中央社会部的建设一开始就立足于高的起点上。首先，坚持将情报工作为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服务。为了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多数地下工作者开展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工作，发动和引导群众拥护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同志通过交朋友、建立据点和充分利用社会关系，搜集掌握了大量的很有价值的情报。其次，注重加强内部制度规范。周恩来要求中央社会部必须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并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为顺利开展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再次，着力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情报能力。周恩来反复强调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与情报工作紧密结合，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中，直接了解内幕情况。有计划地派遣来自不同地方党的特工人员到苏联红军军事学院学习，主要学习收集军事情报和爆破技术，回国后都被派往敌占区从事收集日伪军事情报的秘密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社会部被撤销。其间，我们党的情报与保卫工作基本完成了从零星到规模、从局部到全局、从单一到系列、从获取一般性情报向获取军政战略情报、从纯地下活动到公秘结合的质变过程，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烈士纪念亭碑文敬读

□ 钟雪生

鲜花与翠柏掩映中的河南省郑州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风格典雅的吉鸿昌烈士纪念亭坐落其中。矗立的汉白玉碑体正面镌刻着胡耀邦题词：“吉鸿昌烈士纪念碑”；碑的右侧为聂荣臻的题词：“民族英雄吉鸿昌”。背面为《鸿昌亭碑文》，全文如下：

吉鸿昌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他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一九一三年投军。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为西北军中著名爱国进步将领。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三三年组织领导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寇。一九三四年在天津从事地下活动，建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组织武装抗日义勇军。同年十一月九日不幸被捕，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牺牲，时年三十九岁。

今值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特立碑以志纪念。烈士的光辉事迹将激励我们发扬革命传统，在“四化”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吉鸿昌烈士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
河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碑文300余字，凸显了悼念死者、激励生者的立碑主题，概述了吉鸿昌的革命生涯、光辉业绩和高尚品格。吉鸿昌敢于斗争、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救国救民向死而生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

吉鸿昌，幼名恒立，字世五，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3年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弃学从戎，投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兵。他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人称“吉大胆”，在策应北伐部队时连克强敌，威名远震，不到30岁就被升为军长。

1930年9月，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

石改编。不久，他率部第一次和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交战就损失了一个团。这让吉鸿昌非常纳闷：为什么红军队伍装备落后却骁勇善战？为了看看自己到底是在和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打仗，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吉鸿昌化装成小贩，秘密到苏区考察。在苏区的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红军和老百姓鱼水交融、亲如一家，老百姓主动把自家的孩子送去参军。自苏区考察归来，吉鸿昌终于找到了答案，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帮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此，吉鸿昌对蒋介石拍来催促“围剿”红军的电报见了就撕，并且命令部下，遇到红军时就朝天开枪。当时苏区有民谣唱道：吉军一来，红军喜得笑；先丢机关枪，再扔盒子炮；吉军来打仗，对天放空枪；走时丢武器，送给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矢志抗日的吉鸿昌被蒋介石撤销职务，被迫出国“考察实业”，实则是变相流放国外。在国外，他心系祖国安危，沿途曾多次发表抗日演说，呼吁全中国各族人民在日本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应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坚决抗日。1932年2月，吉鸿昌结束了考察回到国内，经过认真思考，他深深地认识到：“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党组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主动接受党的考验，策反旧部，投奔苏区红军，但没有成功。党组织经过缜密考察，接受了这位赤胆忠心的进步将领。11月，经中共北方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吴成方介绍，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身彻底蜕变。他曾感慨万千地说：“我之所以能够毁家纾难，见危受命，抗日救国，是党的感化，是党的意志。”并坦言“前半生已矣，后半生应直追”。

“有贼无我，有我无贼”

1933年，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投入到组织领导察哈尔抗战活动中。为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吉鸿昌变卖全部家产，拿出6万元购置电台和一批冲锋枪、手枪等军火。5月26日，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

郭隆真：六次被捕入狱的革命女子

□ 徐奇志

人物，她疾呼：“国难当头，妇女应该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约束，救国救民，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在五卅运动中，郭隆真3次遭反动军警逮捕，却越挫越勇，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在法庭上，她总是义正词严，与反动势力针锋相对，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压倒敌人。经过革命的洗礼，她从一个爱国热血青年、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共产主义者。

海外苦寻革命真理。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救国之路，1920年10月，郭隆真受觉悟社派遣，到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艰苦的学习生活中，她认真钻研马克思著作，从中汲取革命营养。当时留法学生受到中外反动势力的双重迫害和摧残，在悲愤中她写下“血书”“泪书”寄回国，揭露“华法教育会”贪污国内寄给勤工俭学学生捐款的丑恶行径。法国当局迫于国内外进步舆论的谴责和中国留学生坚持不懈的斗争，只好收敛阴谋，停止迫害。

1922年，周恩来等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巴黎诞生，给留学海外的青年带来了温暖和光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斗争考验，郭隆真在政治上日臻成熟。1923年，经周恩来介绍，郭隆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24年春，中共旅欧支部选派郭隆真、蔡畅等15位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从中国到法国，又从法国到苏联，郭隆真经历了三种迥然不同社会制度，她的视野更加开阔，革命信仰更加坚定。在十月革命的发源地、



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日伪军进攻，连克康保、沽源等数座县城，接着率领同盟军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塞外重镇多伦。多伦是察哈尔省的北大门，易守难攻，是日军夺取察哈尔的战略要地。同盟军的武器装备很差，连一门大炮都没有，双方差距极为悬殊。

吉鸿昌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在挥师进军多伦的途中，他向部队作战前政治动员，并即兴赋诗：“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7月7日晨，兵至多伦城下。吉鸿昌亲率部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经五昼夜浴血奋战，终于把多伦光复。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热情。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1934年5月，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转入天津开展地下斗争，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旗帜》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列宁的故乡，她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景象，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奋力投身革命运动。按照党组织安排，1925年5月郭隆真回到北京，投身到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中。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郭隆真被李大钊派到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工作，负责对各大学校进行宣传、联系女学生和主办进步刊物《妇女之友》。同时她还担任了西郊香山慈幼院党的地下领导工作。1926年，郭隆真按照党的指示在北京西城创办缙云女校，进行革命活动。她在学校召开秘密会议，联络进步妇女，发展党员，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妇女干部。

1927年春，奉系军阀大肆残害北方的革命势力。4月6日，党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等被捕。极端险恶的形势下，郭隆真从容不迫，销毁文件，掩护其他同志撤退，自己却又遭逮捕，两年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郭隆真被党中央派往东北，与之前来担任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一起工作，郭隆真负责哈尔滨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工作。这一年春节过后，郭隆真冒着凛冽的风雪，到处奔走，发动群众筹建赤色工会。在郭隆真等领导下，三十六棚总工厂委员会成立，这是哈尔滨最早的党领导的红色工会。郭隆真机智沉着地与敌人周旋，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得到刘少奇的高度评价，称赞她是：“在工作上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最正确的大姐”。

永葆坚贞革命气节。山东是郭隆真为党和人民倾注心血、忘我工作的最后一地。1929年前后，由于叛徒出

联络各方，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工部局逮捕，引渡到北平军分会。11月22日晚，北平军分会对吉鸿昌进行了“军法会审”。北平军分会主席何应钦问：“吉鸿昌，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招出你们的秘密来！”吉鸿昌说：“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吉鸿昌慷慨陈词，把法庭当战场，愤怒揭露蒋介石等卖国行径，骂得何应钦张口结舌，只好不了了之。

11月24日，蒋介石密电北平军分会，下令对吉鸿昌“就地枪决”。最后的时刻到了，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走向刑场。走着走着，他忽然停了下来，捡起一根树枝，在刑场的土地上挥手下写了气壮山河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并大义凛然地对特务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地举起枪时，他奋力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吉鸿昌壮烈牺牲时，年仅39岁。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卖，中共山东省委连续遭到重大破坏。1930年8月，郭隆真临危受命，被党中央派到山东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化名郭林一，负责省委和青岛的宣传、工运、妇女等多项工作。郭隆真以女工的身份深入到工人群众中，了解工人的思想和诉求，向他们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使他们认识到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发动大家团结起来进行反帝爱国斗争。一批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很快就恢复和建立了工会组织。在郭隆真等领导下，青岛连续爆发了纺织女工、烟厂工人等罢工斗争，成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经过斗争的考验，郭隆真在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党组织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健全。

郭隆真频繁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探的注意。1930年11月2日，当她到青岛嘉禾路四方村100号与女工谈话时，被特务发现，随后遭敌逮捕。这是她第6次落入敌人的魔掌。

1931年春，郭隆真被押往济南。监狱里，敌人用尽酷刑，想使她屈服，她始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大义凛然地说：“宁可牺牲，决不屈节”。她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机密，从而保护了党的地下组织，直到牺牲前，敌人都没有弄清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